
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

学术自传



历史学部卷 (下)

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
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

学术自传

陳奎
元印

历史学部卷
(下)

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下册目录

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- 张泽咸：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/ 399
- 张显清：八十琐谈 / 413
- 张振鹞：学无止境：我的学术生涯 / 439
- 张海涛：从童工到学者 / 457
- 张海鹏：学术人生
——我的理想与追求 / 477
- 张椿年：我的学问人生 / 517
- 陈之骅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苏联历史研究 / 545
- 陈启能：“一生为了史学” / 589
- 陈祖武：我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/ 615
- 陈高华：读史治史六十年 / 629
- 林甘泉：八十自述：我的历史和史学研究生涯 / 649
- 庞 朴：坎坷辛勤治学路 / 669
- 耿云志：我与近代思想史研究 / 685
- 郭松义：半个世纪的治学心路 / 707

 下册目录

黄绍湘：我与美国史研究 / 735

黄展岳：回顾考古研究之路 / 757

廖学盛：学然后知不足 / 777

后 记 / 797



张泽咸

Zhang Zexian

男，1930年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。195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（1977年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）工作，曾任所学术委员等职务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曾任山东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。

主要从事秦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政治、经济史研究，兼及宋、辽、金、元史。主要学术成果有《汉晋唐时期农业》（上下册）、《唐代工商业》《唐代阶级结构研究》和《唐代赋役史草》，以及四部论文集（《一得集》《张泽咸集（汉晋唐论集）》《晋唐史论集》《耄耋存稿》）、三部资料汇编（《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》《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》和《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》——此件因有别人作品先已出版，故未能付印），合著《中国古代史科学》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》第2卷、《中国航运史》和《中国屯垦史》等。

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

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务农的文盲家庭，家中没有一本书。自幼随父务农，九岁受父命进小学读三年级。当时既不认识阿拉伯数字，也不知加减乘除符号是什么，上课常受老师责骂。小学只有一位教师，也只有一间教室，四个年级同在一室上课。所学只有算术、国语两科，两年内没有学多少东西。11岁进入离家30里的宁乡县第四高小云山学堂住宿就读，师生人多了，所学课程也多了，集体生活相当热闹！学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，统一入寝、起床。我从小受父亲教育，一年四季，天明即起，业已成习，今已80余岁，依然早起。在高小两年，功课多了，学习兴趣也浓，成绩大有提高，对算术课兴趣更浓。高小两年比在初小两年所学知识大为增长。

高小毕业后，我考入了新建的私立友仁中学，校址在宁乡县大成桥，离家70里。学校设在谢氏家族一所旧祠堂内，住宿拥挤。校长谢天赋没有办学经验。学校所在地没有水井，只有一个不甚大的池塘，全校百余人的生活用水，完全依赖厨房旁的这个池塘，生活用完的脏水又倾倒入池塘，循环反复使用，极不卫生。1943年，我身患疥疮，全身痒痛，多处流脓，无奈休学一年，在家用草药敷治。等病情稍好才复学，至1945年夏初才毕

业。初中课程比小学增多了不少，但在新建校，师资水平参差不齐，加上抗日战争时，省县城均被日寇侵占，学校生活条件艰苦，老师教学粗疏马虎，学习收获不大。

1940年，日寇进军长沙，原在省城的众多中学纷纷内迁。迁往安化县山区的学校最多，例如办学有名的明德、岳云、长郡等中学都内迁安化县兰田镇附近，省立一中迁往安化县桥头河。1945年夏，我初中毕业，徒步翻山越岭180里，先后考取了明德（私立中学）、长郡（联立，即公私合办）和一中（公立）三校。考虑公立学校收费低廉（每学期收米三石），我决定进入一中就读。一中校址在安化县桥头河七星街一所旧祠堂内，房屋破旧，只有两层楼，楼上连栏杆也没有，一位男生夜起小解，漆黑一团，坠楼而亡，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，惨不忍睹。

一中相比其他诸校有个较好的传统，即校内民主风气较强，众多古人的爱国诗文在校内广为流传。在那么偏僻的山野农村学校里，居然可以看到薛暮桥著《政治经济学》，未署名的石印本《中国往何处去》（即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）也在学生中传阅。学生居然几次把不满意的校长赶走，这是很不寻常的。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熏陶，得到了良好的思想启蒙。

日本战败投降，内迁诸校纷纷返回长沙。一中校址在长沙市小吴门外，校门几百米外即是巨大机场，每天都有飞机起落，巨大轰隆声，极不利于课堂教学。

抗战胜利后，学校教学条件仍旧很差。除数学和物理有课本外，连国语、英语也无教材，由教师选文刻蜡版印出，随课发下。至于史、地、生、化诸科，完全依赖教师课堂口授，学生自记笔记。一中分设理科、文科，我是文科生，同样无书可读，自己手中仅有武昌亚新地学社编印的一小本中国分省地图册，闲得

无聊，常将它读来读去。内地诸省的重要山川和县市所在，我竟能把它们背诵出来，因此大受地理教师文士员的称赞。化学老师郭德垂忠厚老实，教学认真。他上课时，飞机巨响，全班73个学生（其中有不少是从国民党青年军转来）大都跑出教室看热闹。若是其他教师上课时，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便会停止讲课，甚至扬长而去了。郭老师却不然，哪怕只有两三个学生在教室，他都会照样讲，并且认真做实验，我为此深受教益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在一所初中讲化学课，竟然能依样画葫芦，也成功地做出了化学实验，我对郭老师的谆谆教诲实是永不能忘。

1946—1948年是解放战争处于决战的阶段，我当时对此毫无认识。1947年，武汉大学发生了著名的“六一惨案”，爱国学生惨遭杀害。革命烈火通过地下党迅速传至长沙。6月2日，长沙成功地爆发了盛大的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压迫”游行。我当时对两条路线上的剧烈斗争无知，但作为一名具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，身不由己地迅速卷了进去。情绪激昂地参加了数万人的盛大游行，边走边喊口号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，经过省政府门前，更是劲头十足，拼命高喊口号。但长沙这次游行，国民党方面没有出面干涉，完全是一次和平的游行。当然，不是说国民党方面退让，不作反扑。游行结束，当局部署各校，进行严厉清查，加以惩处。我暑假回家后，收到学校勒令家长严加管教顽劣子弟的通知书，我才知道事情不妙。事后了解，游行之后，在国民党政府部署下，各校都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布置惩处方案。据了解，我当初已被列入开除学籍行列，是敬爱的化学老师郭德垂以自己性命担保我不是共产党，方免于严惩。可是，郭老师的儿子、我的好同学却被正式开除了学籍。1949年湖南解放后，他一直在衡阳地委工作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，他被诬为右派而被整死了，真

是冤哉枉也。

1948年暑期，我从省立一中高中部毕业。那时，国统区没有统一招生方案。我乘火车至武汉参加高考，分别报名清华、北师大、浙大。报清华是因为知道陈寅恪先生在该校，报浙大是知道竺可桢先生在那里。但仅仅参加前两校的考试，我就身患疟疾急忙返家了。随后，收到北平二校录取通知书，令我在定期内，由湘江至武汉，沿江东下，北上经渤海，由天津赶赴北平报到。其时，我大病未愈，发电报请假无回音。病愈后便在家乡教小学。

长沙解放未久，我持北平录取通知书至省府，请求北上复学。省领导王首道亲自接见，指出新旧社会两重天，不能持旧证去北平入学。他劝我报考即将在长沙开考的湖南大学。此后未久，《新湖南报》刊登新生录取名单，史学系录取24名，我名列第五。由于经济困难，我没有就读，回家乡，在友仁中学任教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各校教师奇缺，附近的洮滨中学也一定要我去任教。当时，我每周教课不少于30课时，历史、地理、语文、政治乃至化学、英语我都教。还要当班主任和教研组组长，说实话，真是很忙。由于年轻、精力充沛，接受新思想也比较容易，教学不呆板，很受同学们欢迎。例如，我讲地理课，通常只带白、红、黄、蓝四色粉笔，讲某省，先在黑板上迅速画出该省大致轮廓形势图，边画边讲，用四色粉笔描绘出该省主要山、川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，还联系该省的简称，指出该省得名由来。如此讲述，比较生动，很吸引学生注意力。讲授西南诸省时，他们往往在学化学，西南各地的钟乳石，可结合化学课所言碳酸钙（石灰石）加水的化学方程式作出合理解释，由此极大地增强同学们的学习兴趣。

1952年，我教学所在的益阳专署分管教育的领导找我谈话，

通知我不能再回原校任教了，我纳闷不解，以为自己犯了错误，要等待处理，内心很不安。两天后，通知我调去益阳一中（重点校）教高中。我本人是旧中国的高中生，实不敢去执教新社会的高中，我谢绝了。再过一天，又通知我，不愿教书，可以去升大学。我大喜过望。按当时规定，只能在中南区内的所高校就读。长沙距离武汉较近，我便选了武汉大学。于是，以调干生名义进入了武汉大学。

在武大就读四年，我任班长三年，另一年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兼生活部长。那时，武大历史系也是教师奇缺，一些必须开出的基础课无人开讲，我所在班级的宋、辽、金、元史便空缺，没有授课教师。当时，全校开大课学俄语，我读高中，英语有一定基础，便向系主任提出随外语系学习英语，得到了批准。但同班同学中不少人也不想学俄语，想学英语、日语，说我是班干部太特殊了。系主任找我谈话，我只好回来学俄语。当时我的俄语考试成绩并不差，但至今天，俄语字母也难认了。英语却仍大致保持当年水平，凭字典尚可勉强缓慢看点专业论著。

当年的武大规定，各系均不设选修课，想进阅览室看书很难，找到一个座位，很使我发愁。我逐渐萌生了去系外偷听别系教师讲课。一俟本班没有课，便自由行动去偷听中文、经济、哲学系的课。由是所听诸课的内容很不连贯。自己行动虽是十分小心，唯恐他人知晓。几个月后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。黄焯先生给中文系四年级讲古代汉语，全班只有九个学生听课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发现多了一个人，毫不客气斥责我，将我拖出座位，驱逐出教室，还扬言要报告历史系，很使我无奈且狼狈不堪。

20 世纪 50 年代，政治运动特别多，会多、劳动多。1952 年进行总路线的学习，已是一场斗争。1954 年，武汉遭遇百年未遇的

洪灾，学校停课，上长江大堤劳动四个半月，昼夜不停工。1955年自批判胡风开始，进而扩大为“肃反运动”，停课搞批判。大学四年，真正安定上课的时日很少，所学专业知识更是少得可怜。

1956年，暑期大学毕业，我分配到中科院历史一所工作，工作段限自上古至南北朝（还有历史二所，负责隋唐至清代鸦片战争前。历史三所，分工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史）。我的古文基础太差，向所长尹达同志提出调我去搞近代史。所长幽默作答，同意我学近代史，历史一所的近代史是秦汉，你就学习秦汉史吧！以后如果想学现代史，那就好好学习魏晋南北朝史。我无法对答，只能默默听从。

初到历史一所，研究组内已有由北京大学新到的伙伴朱大昀等人，娓娓谈论在北大学习所开过的众多课程及其教师阵营，北大开出了多少门选修课，如此等等，我听了是十分汗颜，为此惶愧不已。面对现实，我很震撼。怎么办？我不得不深思。回想大学四年中，我干社会工作，开了无数的会，耽误了太多的时间。自己智力不强，基础又差，为今之计，不能再走老路，要努力节省点时间多读点书，以补前失。

既然已认定学秦汉史，自然要迎难而上，我反复认真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当时《资治通鉴》已点校出版，我以它为准绳，学会查字典，一句句、一篇篇地硬着头皮，老老实实去啃，并从中摘抄资料卡片。蚂蚁啃骨头，决不松懈，如此不断努力。时间证明，努力没有白费，学习是在缓慢进行，自己心得日多，渐入佳境。

1959年，天安门前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，我被借调去工作一年，任务是陈列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文物，并培训相关段落的讲解员工作。我既没有学过考古，也完全没有接触过古文物。没有其

他办法，只好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、考古期刊中有关汉魏六朝的部分认真研读，从而有了肤浅的认识。揣摩文物，结合历史文献，一件件陈列，且为讲解员编写了对公众的讲说稿，一年工作下来，我对秦汉六朝史有了新知，收获不少。

1963年，所领导突然调我去史稿组参加《中国史稿》隋唐卷的写作。这时历史一所、二所早已合并成历史所了，但我在当时尚未读过隋唐史料。按领导分配我的任务是编写隋唐民族和对外关系以及思想文化部分，同时还告诉我，史稿组的成员对“唐代客户”有不同认识，因此，要我注意搜集唐代客户资料，并提出本人的看法。我服从了调动。当时还年轻，日夜攻读唐史古籍。将所搜集的唐代客户资料，写了篇文章，在1964年《历史论丛》正式刊出，这是我一生最早刊出的论文。对国内诸民族等方面的资料，我也努力编写成文交给史稿组。后来，我又不知什么原因被调离了史稿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晚期出版的《中国史稿隋唐卷》，其中民族和对外关系部分，依然保存着大量我当年所写并不成熟的文字。

我到历史所已经60年了，自己一次也没有正式提出过请求工作调动。领导却一次又一次地调动我，遂使我的工作战线拉得比较长，但是基本上维持在汉魏宋元之间。在历史所工作的全体同事中，工作战线拉得如此之长，实是很少有的。

有必要提出，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外交部乃至中科院等部门不时要求历史所定时完成某些临时任务，具体承办人通常是张政烺、孙毓棠、王毓铨几位前辈学者。他们习惯于拉我协助，既帮助他们从历史所书库中提取所需用的书，还要我协助他们搞资料，共同完成任务。例如《东北史资料》一书，费时一年余，由张政烺、王毓铨和我共同完成，刊印成上、中、下三册，这是适应当时形势需要，

辑印上自远古，下至辽代的相关资料而成。而《中西方封建社会异同的比较研究》，主要由孙毓棠、王毓铨和我三人费时两个多月，相当具体地列举中西方封建时代相互异同之所在，逐条通过具体史事，进行异同的比较，形成近万字的对照表，提供给郭沫若院长答复古巴科学院院长的提问使用。此外，我还参与过数次临时搞资料的工作。临时工作所需资料，往往不局限于某一段。为此，看书的面既广且杂，逼使我读史面比较宽，战线拉得较长。我这一生，除《明史》有十几卷未曾通读完外，“二十四史”我确是系统地读完了。通读了“二十四史”，说来吓人。但从上古夏商以至明代，我所了解和记忆所及的文献知识能真正弄清楚的，实是太少。多年来，有些外人找我审读论著，我是习惯性地逐条查核作品中的引文是否真实，以之作为评判该作品是否优良的首要条件。一位陌生朋友写了一本有关货币史的书，久久未能通过，出版社送我审读，我核对了作者的全部引文，除偶尔有错漏外，全书资料丰富，论证翔实，我给予很高评价，该书遂得以出版。北师大一位博士生的论文，长达10万余字，作者行文十分自负。该文送我审读，我发现作者行文粗疏，但所论确有新意，我细读以后，写下八千字的书面意见，何兹全先生看后，给我写信，十分感谢我的精细和用心。当然凡是空洞说教或是引文张冠李戴者，我一律不予通过。这类情况，经我手处理者不止一二例。

我笃信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说。我逐卷翻阅过1975年以前译印出版的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《列宁全集》和《斯大林全集》，摘抄的卡片超过万张。但在学习方法上，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，没有认真领会经典作家所言的精神实质。

秦汉简牍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，我曾注意通读。但新简在各地不断涌出，我已来不及一一阅读。我读过的简牍和出土文书



2013 年，在家中

也都没有像对待文献资料那么认真研讨，表现在自己写作上未能运用于具体的研究。

我治史务求真实，不说空话和套话、假话，指导博士生写论文，也因其所长而选题，要求写作朴实，不许行文空泛。

我年过八旬，垂垂老矣，至今不会使用电脑写作，不会通过互联网检索资料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。几十年来，个人治学重点在于汉晋唐宋时期。从事写作不是以论带史，而是努力追求论从史出。学习重点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，文化史所知甚少。政治史方面侧重于政治制度史的探讨，比较注意对史事探本溯源，言其流变。例如对吏部选拔用人的形成过程，我便是从探索历代选用人才的角度，考察其发展历程所达到的最终结果。

我对经济史的研究，偏重于农业的粮、茶等生产方面，这和个人农村出身，幼习农事，对农作略有所知密切相关。在个人的治学历程中，对历代农书包括明、清时的现存农书，都有较多留



2007年4月，与夫人合影

意，对水田和旱地的耕作历程及其收获程序的认识，均与亲身经历密不可分。

举例来说，我写作的长篇论文《论汉唐时期的水稻生产》在《文史》刊出后，颇有一些积极的反映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李增高先生（香山正白旗）来信，诉说他亲自去《文史》编辑部没有买到该刊，他为此要我为他复印一份。1989年1月，他来历史所，和我交谈两个多小时，临别送我京郊所产大米20斤。对北方的旱作粟、麦，我的阅历比不上水稻生产，但有几年在华北多处乡村参加过旱种，因此，也略有知晓。年轻时，我参加过种茶、摘茶和炒茶，所以，写作《汉唐时的茶业》一文，自信不会存在不实的外行话。

《中国古代史科学》是一本集体编写的论著，自先秦殷商至

明清共分10章，我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两章。1983年初版，即印了1.7万册，其后，北京出版社续印6次。出版发行后，我收到读者来信6封，有表扬赞美的，也有质疑的，最重要的是来信指出错误，我实在对不起读者。200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改版重印该书时，我对这两章的内容和文字表述都作了些校订和补充，虽然尽了努力，一定仍存在不少谬误。最近，中华书局决定正式排印出版《中国古代史料学》，我已把自己所写两章再次作了力所能及的修订。

最后，有必要指出，我从1956年分配至历史所工作，其间20多年，机关没有进行评职称工作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未久，历史所恢复招收硕士生和评职称工作。此时，机关领导三次动员我招收硕士生。我注意到所内不少同事对此很热衷，我不想凑这热闹，坚决谢绝了。

1985年，我晋升为研究员。1989年、1992年先后两次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，授予我“中国古代史”和“中国经济史”博士生导师称号，成为当时历史所内唯一的一身兼两学科的博导。此后的招生中，曾有三批考生的专业成绩相当优秀，只因外语成绩不及格被淘汰，这对当时的中国古代史考生来说，实是有失公平。实践表明，仅以外语成绩为界线考入的学生，专业知识大不如名落孙山者。研究生院仅为外语把关，不考虑社会背景和古代史的特性，显然有欠公平公正，是很不合理的。

也是20世纪80年代，上海师范大学给我寄来聘书，聘我为兼职教授。我为此曾去该校对研究生讲授一个月专题讲座。题目是“论汉宋间的寺院经济和寺院生活”，每周讲三次，每次讲三四个小时。其时，山东大学的党政领导利用我在该校参加博士生答辩会的机会，专门找我谈话，希望调我去山大工作。主动承诺